

离开清华几十年的工作经历

○牛竞存（1947—1949 外文）

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5月初我被党组织调到北平市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筹备委员会少年儿童部工作。我当时是清华大学外文系二年级学生，中共地下党员，青年团总支部委员，学生自治会第四届理事会的福利委员。和我前后同时从清华大学调到青年团市委任大学部长的还有王浒同志。我到少年儿童部工作不久，部长华顺被调离团市委，团市委任命我接任少年儿童部部长。当时团市委在王府井南口，一个带地下室和小礼堂的二层小楼里办公，工作人员大约有一百人左右，除了杨伯箴、张大中几位领导人外，大部分是刚从北平各大中学校调出来的地下党团员学生，年龄都是二十岁上下，还有少数老区来的工农干部。当时实行供给制，都没有工资，除免费食宿外，每年发给每人

两套灰色单制服，两年发给一套灰色棉制服；外出工作可以骑公用自行车；没有节假日，工作不分昼夜，当天的事办完才去集体宿舍休息。

1949年10月1日下午，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北平改名北京，成为首都。大会场设在天安门城楼和天安门广场。东长安街排上的游行队伍，最前面是军队，紧接着是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各界职工和市民群众代表。国家领导人毛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等登上天安门城楼，礼炮齐鸣，歌声飘扬，毛主席向全国、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台上台下欢呼“毛主席万岁”，欢呼声和掌声经久不息。中国人民多年来深受帝国主义欺压，日本鬼子入侵中国十多年的苦日子结束了；蒋介石反动政权被推翻了，中国人民心中无比的高兴。这一天中国人民永远铭记、年年庆祝。

在我从清华调到北京团市委工作的四年，每年都参加国庆节庆祝大会，同时我还带两名优秀少年儿童队员（以后改名少年先锋队）登上天安门城楼向毛主席献花。

1999年1月，北京电视台邀请我和当年少年儿童部的江敬文、姬君式同志和几次国庆节给毛主席献花的儿童重上天安门进行采访。那时的少年儿童队员此时都已60岁左右了。他们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对国家贡献不小，有的从事航天事业，有的是优秀教师、科学家、劳动模范。这段采访



前排左2 陈庸勋（地学系）、左3 牛竞存（外文系）、右2 吴宏宛（社会系）、右1 蒋励君（金凤，外文系）；后排左2 卢鹤维（刘华，经济系）、左3 王士林（外文系）

□ 回忆录

被收集在建国五十周年大庆期间播放的纪录片《国典春秋》第一集中。

在少年儿童部工作一段时间，我深感责任重大，自己刚参加工作，缺乏工作经验。我找到团市委书记杨伯箴、张大中同志，要求他们另派一位经验丰富的同志来主持少年儿童部的工作。后来领导将中学部部长周世贤同志调来任部长，改任我为副部长。周世贤同志经验丰富，口才很好，我跟着

他工作一年，受益匪浅。1951年初周世贤同志另有重任调出少年部，我继任部长。少年儿童部的同志都把少年儿童看作祖国的花朵、祖国的未来，十分热爱这项工作。我们到中小学校试建少先队，创办《北京儿童报》，建立起第一个少年之家（在北海公园内），还在景山公园建了少年宫，夏天又在中山公园举办了夏令营。

1951年我受青年团中央委派，带一个少先队小队去保加利亚参加国际少先队夏令营，和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匈牙利、捷克、波兰、民主德国等国家的少先队一起，在斯大林城黑海之滨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夏天。后来成为影剧双栖明星的郑振瑶就是这个队的副队长。回国途中，我们顺路参观了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和苏联首都莫斯科。1951年至1952年期间，江敬文、李学信、王静庄等同志也曾分别带领几个少先队代表队去苏联、匈牙利参加夏令营，到民主德国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北京团市委于1989年为纪念少先队建队40周年，出版了《阳光下美丽的事业》一书，其中有我一篇文章《崇高



牛竞存（中）和当年曾给毛主席鲜花的儿童及同事在天安门城楼上

的事业 幸福的回忆》，就记述了这段工作。

在北京团市委工作的四年中，我感受最深的是领导们的工作作风非常好。他们没有官架子，密切联系群众，能听取群众的意见。例如团市委领导杨伯箴、张大中同志年底总结工作，听取群众的批评、意见后竟感动得流下眼泪。一些高级领导干部没有官气，群众都可以直呼其名，再加上最亲切的称呼“同志”。比如彭真同志当时是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我们见面都叫他彭真同志。在北京下令取缔妓院时，他亲临现场查看、指挥，次日市政府一声令下全市妓院一律封闭。在大搞卫生运动时，他亲自跑到老百姓住的四合院去检查是否彻底干净。连我这个年轻的小干部也常被他叫去询问学校的情况。

记得1952年夏天的一个星期天，我正陪同一个小学少先队的中队参观崇文区某印刷厂，突然接到彭真秘书打到工厂找我的电话，叫我立即赶到市委去见彭真同志。去后才知道彭真同志叫我汇报当时暑假中小学校老师是否真正得到了休息。因为解放后每年寒暑假教师都要参加政治学

习和许多学生活动，市政府通知今年暑假一定要让老师休息好。当听我汇报今年暑假停办政治课并停止部分学生活动后，彭真同志才放心。每年国庆节前，彭真同志都叫我带上预选出的几个优秀献花儿童到他家与他一起吃顿午饭，在谈笑聊天中进一步了解孩子们的家庭、性格、学习、身高、相貌等情况，最后挑选两名最优秀的儿童上天安门献花。他有时因劳累不舒服星期日到公园去休息，还叫我带几个小学生和他一起到北海公园去划船、走走。北海公园北岸上的第一个少年之家就是在我的提议后，他视察并和有关部门批准选择一个宫殿遗址建起来的。

又如青年团中央书记冯文彬同志也常叫我汇报少年儿童工作，当他听我说团市委领导重视青年团工作忽视少先队工作后，他指示北京团市委领导要十个指头弹钢琴，不仅要抓青年工作，也不可忽视少年儿童工作。他对当时学校对少年儿童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光讲大道理并搞形式主义的做法提出批评。为此他给少先队辅导员作报告，要求一定要按照儿童的特点开展喜闻乐见的活动，寓教于乐。

1952年胡耀邦同志到团中央任书记处书记，他平易近人，经常到团市委和学校了解少年儿童工作情况，并亲自给少先队辅导员作报告。团中央少年儿童部部长陈琏同志（蒋介石的大秘书陈布雷的女儿）还经常下来参加少先队的活动，与我们一起探讨工作。在这些领导干部的言行中，我们感受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些共产党的优良作风，从而以他们为榜样，把这些作风贯彻到自己的工作中。

1953年组织上把我从团市委调到华北

团委少年儿童部任少年儿童科长，但1954年8月华北局、华北团委撤销了，组织上调华北团市委书记蒋毅同志到内蒙古工会任副主席。我是他的秘书，就带着刚满半岁的大儿子到内蒙古工会工作了，在内蒙古工会当了三年秘书。过去做少年儿童工作，我熟悉中小学生，我现在必须了解工人，因此再三要求到工厂第一线去工作，以便熟悉工人。

1957年5月，组织上调我到新建第一毛纺厂当工会主席，以后又当了副厂长。我经常到车间和工人们一起劳动，参加他们的班前班后会，关心他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基本上能做到每天与三班工人都能见上。工人们爱厂如家，努力工作，不计报酬，深深打动了我。如老工人房玉山经常加班，不声不响到处检查维修下水道，我发现后给他报了加班费，他却推辞再三后才去领。机修工张师傅经常到垃圾堆里捡废铜烂铁，也会在坏灯泡里收集铜丝用于维修工作。又如修补工党淑珍每天低头修补呢子，珍惜每一分钟，连头都舍不得抬。她的名言是“抬头误三针”。类似事情很多，只要工作需要，厂领导一声令下，全厂职工都会齐心协力，想方设法完成任务。厂领导也是忘我工作，白天深入车间，晚上开党委会到深夜，平时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有时工作需要就通宵不睡。1958年大跃进，全厂完成全年生产任务200%。厂党委决定除书记、厂长、工会主席外，给全厂职工年终发双薪。领导干部吃苦在先，享福在后，也激励着工人。1958年大跃进，我的小儿子出生，产假56天，我只休息了一个月就提前上班了。

我在一毛工作三年，1960年被调到呼市市委政策研究室当副主任，我依依不

舍地离开工人朋友。这时我常下农村了解农民和农业生产的情况。1964年春我又调到呼市科委任副主任，我感到在机关工作开会多，想进一步下乡了解农民，因此报名参加农村“四清”工作队任队长。我骑自行车驮上行李，到桃花公社茂林太大队工作近三年。在农村我早起拾粪，白天下地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入冬我患了气管炎，巡回医疗的大夫给我打针吃药不见好转，劝我回市里休息治疗，但我不肯扔下工作回去，大夫开玩笑地说：“真是铁人！”由于劳累，气管炎几个月不好，发展成了慢性支气管炎和肺气肿，从此一到冬天就犯病，折磨得很痛苦。一直到60岁离休后，我经过多年坚持锻炼，才逐渐好转。

在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的同时，也发动群众提意见，结果发现村里大小队干部基本上都很好，因此战果平平。但我收获最大的是广大农民吃苦耐劳、淳朴善良，使我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农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大队的妇女队长芦银银是贫下中农，热情能干，我住她家，和她婆婆、女儿们睡在一个大炕上。不久她的大姐从南营子村来了，她大姐的头上有一处伤痕，平日沉默寡言。经过了解才知道，她大姐是南营子村的妇女队长，丈夫早年去世，她带着四个尚未成年的子女生活，全家靠种田、放马、在马路上拾拉煤车掉下的煤渣生活，十分艰难。“四清”运动中她被诬陷、受检查，一时想不开想自杀，用剪刀划伤头部，经过救治被送到芦银银家调养。四个子女中老大已出嫁，其他三个孩子无依无靠。我经过调查了解情况属实。我很同情她的遭遇，在生活上关心她，慢

慢地她很信任我，并向我吐露了心结。为了治愈她的伤痛，我带她回呼市我家居住，一方面带她到市立医院去治疗头上的伤，另一方面找我的邻居公安局长来安慰她，说她没有违法，保证不会再有人找她的麻烦。她因此放心、平静下来了。此外，我还经常给她点钱、粮食，帮助她的家人。后来又到她住家所在的社区为她办了笔困难补助金手续，她十分高兴。不久我和她妹妹把她送回南营子村，孩子们无比兴奋激动地迎接妈妈回家。从此我家和芦银银姐妹两家来往不断，结下了无比深厚的姐妹情。

为了让儿女们体验农村的艰苦生活，我让两个较大的儿女在寒暑假也带上点钱和粮票轮流到她两姐妹家住段日子，让他们从小就体验到农民的艰苦生活，同情他们，帮助他们。我老伴是我的同学、同乡，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在内蒙古日报社时事部任主编，一度也当“走资派”失去了自由。三个未成年的儿女学校停课，在家独立生活。14岁的大儿子韩大欣买菜做饭；12岁的小女儿晓荣打扫家、洗衣服；10岁的小儿子大明拉风箱帮哥哥做饭。有空时，哥哥带妹妹、弟弟温习点功课。这时在农村的芦家大姐常来看望三个孩子，当大欣参加锡盟建设兵团时，大姐流泪送别。在农村的两家子女长大后多数在呼市找到了工作，成家立业，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并且都很孝敬老人。大姐的儿子刘文寿很懂事，21岁就参军了，在部队抓紧机会学习文化，复员后到呼市工会工作，之后他又上了工农兵大学。由于他工作敬业、能力强、有文化，很快就当了市工会副主席。文寿为人忠厚、坦诚、热情，我只做了点微不足道的事，他却总记

在心中，每逢过年过节全家聚餐总请我们夫妻一起去吃饭。

1966年春“四清”运动结束，我又回到市政府，被调到文化局工作。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市委决定三个剧团（歌剧团、晋剧团、杂技团）集中在一起开展运动，让我负责组织工作组领导运动。晋剧团马德才反对工作组，当时中央认为谁反对工作组，谁就是反对革命。因此马德才同志首先被打成“反革命”。群众起来批判三名三高、文艺黑线，康翠玲、任翠凤等晋剧团名演员都被批判。不久又反过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因批判马德才、镇压了群众，执行资反路线，而被揪斗批判。我被戴上三顶帽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假党员”（地下党）、“地主狗仔子”（父母是地主），戴上高帽子游街示众。我曾主动诚恳地向马德才同志赔礼道歉，马德才也是个老实厚道的同志，以后我们成了好朋友。与此同时，我爱人韩蕴清也被当“走资派”扣押，我婆婆被当地主赶回河南老家。不久又开始打“内人党”，说内蒙古的共产党就是“内人党”，被扣压的“内人党”被武力暴打，在火炉子跟前拷打后，夜里被扔到冰天雪地里，很多人被打伤致残。因此我趁还没当“内人党”挨打，偷偷跑到北京、天津老同学、亲友家躲避一年。直到党中央不让打“内人党”了我才回呼市，这期间我老伴也失去了自由。

“文革”去石家庄学习一年多，这段时间家里只留下三个儿女独立生活在市政府家属院两间平房里。当时中小学都停课了，他们只好生活自理，大儿子常去左邻右舍看人家怎样炒菜做饭，有时遇到困难，邻居们都帮忙。1969年呼市各单位的



牛竞存学长（2016年4月）

“走资派”都参加学习班到石家庄学习一年多，我1971年4月从石家庄回到呼市时，只见到我老伴领着两个小儿女接我，原来我大儿子大欣参加锡盟建设兵团去锡盟草场了。

1978年恢复高考后，大儿子考上天津大学，女儿考上南京邮电学院。大儿子大学毕业后工作几年又考进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小儿子参军回来考上电大，他们工作都很好，让我很放心。我们夫妻二人都于1984年离休，这时都已超过60岁了。我和老伴分别在报社和附近的小学校义务帮了几年忙才休息。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清华的老同学们和北京团市委的老伙伴都已退休，每年都有聚会。我身在呼和浩特，但他们聚会总叫着我，我也争取每次都去参加。大家非常亲热，争着要我住他们家，互相叫着当年的绰号，我虽然八九十岁了，他们仍叫我“小牛”，我们都有共同语言，共同关心党和国家大事，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清华百年校庆时，我和大儿子都是校友，参加了各种活动。现在我还和老校友、老伙伴们有电话来往。